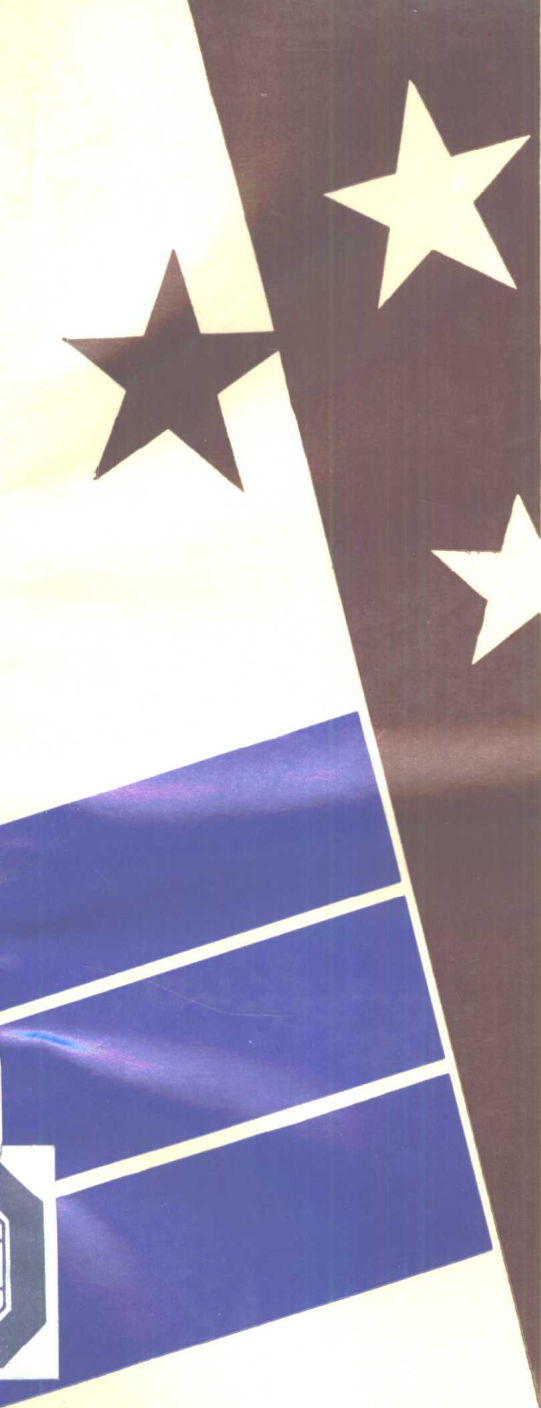


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袁明 主编 重庆出版社



004037

**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袁 明 主编

重 庆 出 版 社

1992·重庆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郑 玲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袁 明 主编
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 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08千
1993年 3 月第一版 1993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00

*

ISBN 7-5366-2059-4/D·109

定价: 6.00元

中国和外国关系

(代序)

陈忠经

1991年6月间，我应北京大学袁明教授之约，参加他们那里主办的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会开得很不错，特点之一就是发言踊跃，而且颇有些不同意见。在这类学术交流的场合，不同的意见相碰撞，才更能闪现智慧的火花，促进思路的深入和展开。我这篇短文，也可能有些朋友，特别是外国朋友不以为然。不要紧，我说说，请随意看看吧。

我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很有必要认真研究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我这里着重要提的，是他在1956年春，苏共“二十大”开过之后不久，所作的一次《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特别是第十个问题，“中国和外国关系”。在这一节中，一开头他就提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思想——他的独特语言“两点论”。不要搞“一点论”。他开宗明义地提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评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想，上面引述的“外国”、“一切国家”，当然应该包括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有的西方国家，以及最近解体的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同时，毛主席强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而另一方面他也力戒：“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需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这也是两点论。

《论十大关系》，是另一篇《矛盾论》；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讲话（特别是针对当时苏联的第一次剧变，主要谈我们自己），也是一篇深刻的哲学著作。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疾速诡谲，我们国际关系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加以冷静观察，深入研究，进行全面的（两点论）、历史的（从发展上）、具体的（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毛主席在这一节中也提到：“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想，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包括这篇著作，我们也要采取同样的科学态度，不能每句话都照搬。不能搞“两个凡是”。

（1992年1月）

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代前言)

袁 明

20世纪已经进入最后一个10年了。地球上的人们正在做各种准备，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将人们的视野扩展到太空宇宙，但是目前人类所具备的知识条件与物质条件还不足以让我们以更开阔的宇宙视野来研究和比较各种社会变化。本世纪末的人们更多地关心的还是自己身处的地球、区域、国家、地区中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就国际关系的变化而言，我们也只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看一下地球上最近几个世纪交替之际的一些特点。

首先做一点历史的回顾。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为之震动。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与法国展开了反复的政治军事较量；俄普奥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完全从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又使欧洲国际关系处于急剧的变动调整之中。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国际政治可以说是以武力为主导的。外交虽然亦极为频繁，但比之武力来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那一时代的欧洲哲

学家们如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是从各自角度提出解决欧洲国际问题的政治方案和论述。政治家们亦从各自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出发设想着欧洲国际政治格局的前途。各种力量消长冲突较量平衡的结果便导致了1814—1815年维也纳和会提出的“欧洲协调”，即大国之间相互协调，从而达成一定的“均势”并保持一定的和平局面。

19世纪刚迈入最后一个10年之际，一贯玩弄“五球不落”的政治游戏并在欧洲政治中纵横捭阖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90年下台。由德国所起主导作用的俾斯麦外交体系很快失去了平衡。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实力迅速上升，德皇威廉二世提出了“世界政策”。急剧崛起的德国急于同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较量。英德军备竞赛加剧。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次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英布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预示着国际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局部危机与战争不断。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前，世界又即将到世纪交替之际。国际风云又急剧变幻。东欧巨变、德国统一、海湾战争都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一些局部的国际政治热点趋于降温时，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欧洲局势动荡，最突出的事件是横跨欧亚大陆、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的迅速解体。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国际政治版图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开始了大变化。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上述的几个历史片断掠影至少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现象，即每每到世纪交替之时，国际政治便动荡不定，矛盾复杂错综，国际

格局亦孕育着新的变化。18世纪末的欧洲国际关系矛盾运动结果导致了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19世纪末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斗争引发了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世纪末期由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新的国际体系又在孕育之中。而且，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由于历史运动而不断增加新的角色，其中不但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还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或全球的国际组织。我们说国际格局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暂时平衡（或合力作用）所致。目前构成这一合力的因素是越来越众多和复杂了。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国际关系变化的新挑战。这是跨世纪的挑战。当然，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挑战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对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来说，在目前世纪交替之际所面临的挑战至少有几点与上几个世纪相似，即如何在大变化中思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发展的问题；如何解决地区冲突的问题。“地球村”中并不平静。这些挑战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和衰落，发展和落伍，甚至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二

如单纯地从表象来看几个世纪来国际关系格局或体系的变化，甚至发现其中的某些特征与巧合之处是逃遁不掉的。这些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或周期循环。它们所展示的现象背后的许多深层历史因素还有待于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诸如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科技革命的影响，异质文化间的整合与排斥，等等。但是，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变化的确使人们看到以下的问题已越来越不可忽视了。从跨世纪的挑战角度来说，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花相当的精力注意国际问题。如果说两个世纪以前，亚洲国家对在欧洲所发生的震动全欧的法国大革命可以保持超然态度，现在则很难做到绝对超然了。一国的国际环境往往对这一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影响，有时影响还相当强烈。面对这样的现实，重视国际环境、研究国际问题，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日程表上的相当重要的事情。国际关系越深入发展，就越要多考虑国际政策。国际政策会牵制国内政策，国内受国际的影响与制约。孤立主义、闭关自守都是行不通的。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二、从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演变过程来看，许多国际矛盾与冲突都是战争和武力最后解决问题。如果说19世纪国际关系在欧洲保持了近100年和平的话，在20世纪则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残酷与破坏程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20世纪后半期，旷时约40余年的美苏冷战局面又使世界武器库中增加了核武器，其毁灭力量和杀伤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军事力量。现在冷战虽已结束，但是由于美苏对抗所引起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却为这一星球遗留下严重的核扩散问题。区域的军事集团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安宁。对军事问题（军事战略，军事理论，军事力量）的重视和研究亦为各国领导人和研究者所关注。在当今国际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

发展情况下，军事战略与科技发展又密不可分，它们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际组织正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的数量之多，分类之广足以编纂一部大辞典。这些组织有世界性的，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亦有区域性的，如欧共体、东盟、非洲统一组织等等。它们的性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教、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它们是重要的新角色。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它们不同于传统的主权国家。但是在国际社会里它们有时却发挥着单一的传统主权国家所不具备的整体作用，它们积极地参与并影响着国际力量结构的平衡。相对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前半期来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组合趋势，而且经济组合趋势超过了军事组合趋势。这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亦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

四、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起日益显著作用的是众多跨国公司的兴起。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在贸易、金融和生产领域，各国经济一体化成全球经济和跨国经济这一情况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今天，一个商品和劳务的世界市场正在取代一个由相对孤立的民族市场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被一体化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之中。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来说，在投资资本的配置和生产场所的确定方面，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主要的因素。”^①这一现象仅仅从经济这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国际间的依存与依赖。事实上，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早已出现。它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成正比。由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信息革命的

全面推动，使它在20世纪末成为一种特有的而且还在急速发展的世界性现象而受到重视。

五、人类文明史长达几千年。在交通落后、通讯困难、各地区来往较少的情况下，各种文化处于较少与外界沟通的状态。有的通过自身机制发展丰富，有的则自生自灭。在现代国际关系发展，交通通讯条件发达的情况下，原来被局限在一个区域或地区内的文化便突破了旧有的框架，开始与其他异质文化接触碰撞。在这种接触中有的是积极主动的，有的则相对被动，但由于基础雄厚，亦往往后发制人，反冲击，反挑战。在国际政治中，文化因素是较政治、经济、军事因素来说更为深层的因素，它是各种不同的文明积几千年的经验而自然形成的。它不在表层活动，但几乎无处不在。它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政治追求。国际交往越是频繁，文化因素亦会越活跃。以个人承受上帝真理为基础概念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的虔诚、儒家系统的大我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观念并存局面将长期存在，并且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位西方学者认为：“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真正谴责伊朗扣留美国人质的行为，这暴露了文化上的鸿沟和怨恨。”^②无数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些鸿沟的缩小不能靠强权政治来实现。相反，强权政治只会扩大鸿沟，给新的国际冲突埋下导火索。

六、在世纪交替之际，人们观察国际问题的视野已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扩展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大气层污染、人口增长、人权问题、反毒品等诸多方面。国际间现实的与潜在的冲突都与这些问题有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打开思路，要求大批在某一方面有实际知识的专家

的介入，要求有更为广泛、务实与深入的对话。

七、面对种种新的挑战，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门学科从历史学和法学中独立出来始于本世纪初。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学科从总体上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很不平衡。然而，随着国际关系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快速发展，各国在学术文化交流上的增多，这一学科亦在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当是着眼于全球的，将国际关系学科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之内是难以反映它所需要展示与解释的极为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的全貌的。但是，就每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它又不可能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活动角色的增加，活动内容的丰富，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中的人们都面临着这个如何突破原有的水平和如何参与新的发展的问题。同时也都在探索突破的角度。

对于当代人们来说，冷战格局的迅速解体，国际风云的莫测变幻，全球与区域力量平衡的重新调整，都是新问题。但是，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如果进行有一定理论层次的思考，以下的一系列问题还是带根本性的：

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冷战格局的终结？西方著名的冷战史学者、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加迪斯最近撰文说，是“一体化进程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他将信息革命、经济发展、安全概念的变化、对和平的追求以及思想方面的相互影响均归于“一体化”的范畴。^③与过去的维也纳体系解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解体相比，导致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历史力量有什么

新的特点？质言之，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国际政治的新概念已经或者正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出现。凭借着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它们又很快在世界上扩散。“相互依存”说即为一例。这些新概念向传统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如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的主权原则，等等。究竟如何从这些新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的内涵，它们在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去进行考察呢？它们与传统的基本概念的关系应当如何界定？一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国际政治问题在表象上可以千变万化，但剥笋剥到最里层时，终究会发现国家的内核。国家和它所追求的现实和长远的民族利益，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确定无疑的。”④我们从这一论断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位置，也一直困扰着政治家、外交家和研究者。在冷战阶段，这个问题或是被强化了意识形态，或者被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分裂现象所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淡化了。但是，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这些现象又迅速将民族主义的力量展现无遗。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因素的力量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在冷战后时期它又会给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在冷战后时期，一些古老的国际政治原则如所谓的“均势”原则、“大国协调”原则将会继续起作用吗？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们或以冷峻的口吻，或以抱怨的心态指出国际政治中“旧路标已所剩无几”，甚至“荡然无存”了。如果那些古老原

则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消失的话，它们还将会帮助政策制定者们设置路标的。

总之，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直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古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重现，还是一系列崭新的挑战？或者说，在古老问题和新的挑战交替出现但又都在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时，应当如何去衡量与判断它们的作用与影响力？

这些问题的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因为它们一直困扰着国际政治学者。它们对一代又一代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国际关系学科亦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当然，理论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情况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关系学科较早地出现在经济发展较早较快、急于向世界各地扩张、相互间实力相争激烈、权力斗争尖锐而且矛盾也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在西方。从时间上说，大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三

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在西方近一个世纪来的发展情况，中国学者近年来已作了一部分介绍。从纵向透视，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互相衔接渗透的几个阶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阶段相呼应，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历史阶段（即从历史学与法学中独立出来），组织阶段、以分析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军事战略为主的阶段，以研究意识形态和决

策过程的阶段，以及创造理论体系的阶段。从横向考察，学者们则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就有理想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派、科学行为主义流派、传统主义流派、新现实主义流派之多。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园地中所呈现的各派学说斗奇争妍的蔚然大观呢？首先是世界政治的急剧变化，尤其是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向学者们发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的急切呼唤，其次是各国尤其是大国本身利益的需要；第三是因为学者本身被身处环境激发了科学探索的冲动。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威廉·福克斯在1966年所说的：“谁能预料，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果园里，一颗苹果不会落到一位正漫步经过那儿的国际关系学者牛顿头上呢？”^⑤

毋庸讳言，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们进行的研究必然受到他们身处的国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亚当·罗伯茨在向中国同行介绍他对当前国际关系的观点时开宗明义地说：“在考察这些问题时，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从事写作的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⑥还在美国国际关系教学早期阶段，美国学者亦公开宣称：“美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为条件的。”^⑦另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开放性、活跃性和批判性。小范围的辩论和大规模的论战几乎在每一发展阶段都不乏其例。不少学术争论都是超国界的。

也许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如

60年代后期，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异军突起，另辟蹊径。他们批评以汉斯·摩根索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学说缺乏真正的科学性，提出要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来改造旧学说。论战在美国拉开帷幕。当时威廉·福克斯评论说：“同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计算机革命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技术。储存和取出数据的新方法将为定量研究打开新路。但毫无疑问，这种数据的泛滥所造成的问题会如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在这一方面，一支削尖的铅笔可能要比一台电脑更为有用。”^⑧更为广泛而学理性的争论随之而来。直至80年代，当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学者认为“尘埃已经落定”之后总结说：科学行为主义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不像传统学派那样注重于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其二是它大大拓宽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几乎是包罗万象；其三是它的有选择性，它“完全不谈国际道义、国际法、正义和秩序、冷战、中苏关系以及所有当代问题。”^⑨这一场争论虽然已告一段落，但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不能说是对科学行为主义盖棺论定。随着生态环境、人口爆炸、大气层污染、自然资源分配等问题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以后，人们要问，科学行为主义是否还会重整旗鼓呢？

与此有关的是关于“相互依存”论的讨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有的介绍中所说是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率先提出的。它的来源要早得多。即使在美国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还未出现之前，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战争、全球的观念、个人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检示国际生活中的动力、行为、政策和格局，”并以此来对“排斥还是相互依存两者谁更重要”这一问题提出答案。^⑩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入发展，对“相互依存”论的关注愈

加增多，出现了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存》等专著。他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新概念，认为国际间相互依存会加强，其中包括跨国银行或跨国公司的作用；国内与国际问题的界限将模糊不清；军事力量依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的提出，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最突出的新发展。”^①尽管这一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广泛注意，被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英国学者仍以最近发生的南斯拉夫内战为例，对“相互依存”论的理论方面提出了质疑，指出：“相互依存究竟将对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有必要认真予以考虑；”“我仍然对下列这类主张持怀疑态度：相互依存在90年代将彻底改变国际体系，而且这种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②

此类的学术争论不胜枚举。由于争论本身关系到各个国家都必须注意的国际环境、安全与发展问题，关注与参与的力量也不断增长。由于争论主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展开，它们凭借在人员、资金、语言、传播方面的全面优势，对世界其他地区这一领域的工作及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仅以东亚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有不少青年学子负笈美国，相当一批人攻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门学科本身在东亚并不具有像西方那样的基础和发展史。因此，东亚的学生不得不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有成果为蓝本。这一情况对东亚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注意到这一现象本身的同时，还应当考察这一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背景。